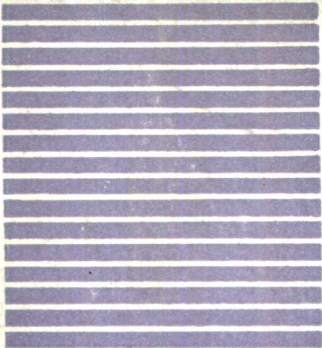




欧洲经济史

第二卷

十六和十七世纪

[意] 卡洛·M.奇波拉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310
1703
282

欧 洲 经 济 史

第 二 卷

十六和十七世纪

〔意〕 卡洛·M. 奇波拉 主编

贝 昱 张 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8年·北京

Editor Carlo M. Cipolla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Glasgow 1976
本书根据威廉·科林斯出版公司 1976 年版译出

ŌUZHŌU JINGJISHI

欧洲经济史

第二卷

十六和十七世纪

[意] 卡洛·M. 奇波拉 主编

贝 昱 张 菁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装

ISBN 7-100-00306-7/F20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438 千

印数 4,200 册

印张 18 2/3

定价: 3.65 元

译者前言

本书系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卡洛·奇拉波主编的方坦纳出版社出版的《欧洲经济史》六卷本的第二卷，题名为《十六和十七世纪》。这两个世纪是欧洲一个“过渡”时期，是连接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座桥梁；这两个世纪也是一个“重商的”时期，商业资本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到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本卷共分七章，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当时欧洲的经济活动的画面。本卷的作者们广泛运用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从他们对当时的技术与经济组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

这一时期不象后来的工业革命时期那样具有革命性的特征，过去我国出版的有关外国经济史的著作与教科书往往没有对这一“过渡的”、然而却是重要的时期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张 菁

1986年

目 录

导言	卡洛·M. 奇波拉	1
第一章 1500—1700 年的欧洲人口	罗杰·莫尔斯	7
第一节 两个世纪中人口的演进		7
第二节 现有的资料及其价值		12
第三节 人口统计学的兴起		23
第四节 总人口		29
第五节 人口结构问题		36
第六节 移民波动		46
第七节 自然波动		53
第八节 十六和十七世纪人口变化的节奏		61
第二章 1500—1750 年需求的类型与结构	沃尔特·明钦顿	69
第一节 原始资料		70
第二节 需求的决定因素		74
第三节 需求的构成		99
第三章 1500—1700 年科学革命时代的技术	赫尔曼·凯伦班兹	154
第一节 引言		154
第二节 十五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这一时期所产生的最 重要的技术成就		156
第三节 在各经济部门的供给系统方面所取得的技术成就		209
第四章 1500—1750 年的欧洲乡村	阿尔多·德马达莱娜	238
第一节 引言		238

第二节	资料来源	242
第三节	欧洲乡村的人口、法律和社会状况	246
第四节	农业概貌	265
第五节	农业的生产率	291
第五章	1500—1700 年的欧洲工业 多梅尼科·塞拉	305
第一节	对工业品的需求	310
第二节	产量的增长	336
第三节	变化中的工业地理	357
第六章	1500—1750 年欧洲的贸易 克里斯托夫·格拉曼	365
第一节	重商的时代	365
第二节	地区、通道与运输	371
第三节	商品贸易	389
第四节	货币与信贷	438
第五节	贸易的组织	441
第七章	1500—1730 年欧洲近代金融的产生 杰弗里·帕克	450
第一节	引言: 欧洲的货币存量	450
第二节	私人金融	455
第三节	公司金融	474
第四节	公共金融	482
第五节	危机与重建: 1720 年及随后所发生的大崩溃	502
附录:		510
第四章	“1500—1750 年的欧洲乡村”的统计表	
参考书目		540
译名对照表		569

导 言

卡洛·M. 奇波拉

人们习惯上认为近代史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叶。众所周知，历史界限的划分从本质上说都未免武断而且带有人为的因素；然而，十六世纪开创了一个变化显著的时代，或至少是上几个世纪开始萌发出的一些基础的发展在这个时代有了突飞猛进，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两个世纪前的欧洲已截然不同。

在以下诸文中，读者将主要看到一些在技术与经济领域中产生的特殊发展的例证。如果不将这些现象看作是思想领域、艺术领域、政治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同时发展所引起的更广泛的变化的一部分，我们就很难历史地理解它们。在此强调这一点，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进入十八世纪时，城市国家与小公国已不再在欧洲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代之而起并且日益壮大的是民族国家。在各国的国内史上，总会出现一种同时并进的变动，即在削弱地方司法权的同时，中央政府藉此获得了权力。国家的陆、海军日益壮大，并且，由于工艺技术不仅改进了生产的艺术，也改进了毁灭的艺术，从而陆、海军的经济成本大大增长，远远超出了与其规模的扩大相对应的比例。军费开支在政府的预算中占据了最大的份额。陆、海军费用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税收的大大增加。中央政府攫取和控制了国民产品的越来越大的部分。同时，在海、陆战场上，火炮和毛瑟枪成了决定性的武器，这意味着军事力量与工业生产潜力之间更加紧密的联系。

在思想意识的最上层,“现代人”与“古代人”产生了冲突。^① 实验赢得了在此之前只有哲学思考才配享受的尊重。对于现象的描述已开始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与用公式表示的假设去解释终极原因一样值得尊敬的智力活动。对于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计量的方法也永远得到了普及。正象有人所说的那样,十七世纪的那些“老夫子”和学者们“过分偏重于观察和计算,……他们没完没了、不着边际地忙于记录、编目分类和计数工作。英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将他们的才华耗费在逐一详细地记下每小时的温度、风速与观察天空的变化这些琐事上面。”^② 这些工作多半只不过是积累了一些毫无用处的记录材料。但是,在汇编这些记录材料时所持的那种思想方式却有助于人们进行实验,有助于人们采取系统的研究方法。此外,他们还花费精力去计量经济与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威廉·配第爵士在给他的朋友罗伯特·索思韦尔爵士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就擅长于谈论数字、谈论重量和谈论尺寸,并引以为荣。”正象劳伦斯·斯通教授指出的那样:“发生在十六世纪西欧的那场人类思想的革命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统计方法的发展。正如对于政府职员那样,对于受过教育的老百姓来说,数字也终于开始具有实际的形态。中世纪那些编写年史的人在表示一个很大的数目时总喜欢使用‘成千上万’这个词,这种思想方式已开始渐渐消亡。”^③ 人们渐渐懂得并意识到计量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衡量所使用数据准确性的特定标准(关于这一点,至今似乎仍有为数惊人的计量经济

① 关于这场发生在十七世纪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冲突的历史和意义,见《古代人和现代人:对科学运动的兴起的研究》,圣路易斯,1961年。这部学术性极强的著作主要研究的是英国,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在法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也有了同样的发展。

② W. 莱特温:《科学的经济学的起源》,伦敦1963年,第99—100页。

③ L. 斯通:《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外贸易》,见《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2卷(1949年),第30—58页。

学家和计量经济史学家还没有意识到)。^①至少,科学的基本概念已建立了起来。由于数学的运用,机械学和物理学在知识领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事实上,由于这些学科的成就和发现是如此巨大和惊人以至它们的方法论不分正确与否地为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所采用。从那时起,历史就进入了被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作“世界观机械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一般的文化水平而论,在十六和十七这两个世纪中,尤其在北欧各国,人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有一个异乎寻常的提高,印刷术的发明与宗教改革的宣传繁荣了文化事业。十七世纪期间,甚至在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里面,读书也蔚然成风,这使得平装书的大量生产成为一项经济事业。^②然而,到了十七世纪末叶,荷兰与英国却成了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国家。^③文化在社会各阶层中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它所具有的巨大经济意义无法估量。我们必须牢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真正区别主要并不在于一小批文化贵族的存在,而在于教育要在全体人民中更广泛的普及。

十一世纪初,欧洲还是一个落后地区——也就是现今我们所谓的“不发达地区”——这不仅仅是与我们今天的标准相比较而言,而且与那个时期其他地方的文化、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起来,也是如此。与当时的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中华帝国相比,欧洲属于不发达地区。自十三世纪起,在经济潜力与技术水平方面,欧洲逐渐取得了优势。到十五世纪末,欧洲已毫无疑问成了

① 每一位学习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经济史学的学生都应当阅读和领会 O. 摩根斯顿的《论经济观察资料的准确性》,普林斯顿,1963 年。当今,获得“定量研究者”的名声是一种时髦,尤其在经济史学的领域内更是如此,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加鉴别地和不恰当地利用统计资料,他未必就是一位“定量研究者”,正如一个人如果反对随心所欲地和不准确地引用数字,他未必就是一位“定性研究者”一样。

② C. R. 芒德鲁:《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民间文化》,巴黎,1964 年。

③ C. M. 奇波拉:《西方的文化和发展》,哈蒙茨沃特,1969 年,第 61 页。

在世界上享有最先进技术的地区，而且她的相对优势仍继续得到空前迅速的增长。从数字上看，欧洲人口只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0%—25%左右，^①并且内部是四分五裂，然而，技术上的优势赋予欧洲人的实力远远超过了与他们人口数量所成的比例。掌握了最先进技术的国家最终势必要通过和平的或其他的途径称霸世界。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向海外的扩张以及俄罗斯向西伯利亚大平原的扩张就是由于中世纪末技术力量失去平衡、欧洲取得了过分有利的地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扩张附带造成的后果中至少下列一些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1. 新产品引入欧洲，例如：咖啡、巧克力、瓷器、茶叶、土豆、西红柿、玉米等。

2. 从美洲输入了大量白银，这极大地增进了国际间的流通，而且还导致了：

3. 国际贸易的大量增加。

4. 造船工业与金属制造工业的显著发展。

尤其是国际贸易以及银行与交换的各种手段的发展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商业革命”，至少这个术语适用于1550—1700年间的荷兰与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它使得财富大量积累起来，它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壮大，它刺激了

① 正如J. 莫尔斯在下面一章中指出的那样，在大约1500年左右，欧洲人口肯定已接近于8,200万，在大约1600年左右，已接近于1.05亿，在大约1700年左右，已接近于1.15亿。在大约150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肯定已接近于1亿，在大约1600年左右，已接近于1.5亿。在十七世纪第二个25年中，由于一系列灾祸，中国的人口急剧减少，但是，紧接着的下一个时期，人口数量又开始回升，到大约170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数量再一次达到1.5亿。（参看P. 霍：《对1368—1953年中国人口的研究》，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9年）。美洲人口在1500—1650年间发生了一次锐减（关于这一点，可见考克斯和博拉所作的种种研究），在十七世纪中叶，整个美洲大陆是否有800万以上的人口还是件值得怀疑的事。看起来有可能的是，在1650年左右，世界人口大约在4.5亿到5.5亿之间。

扩张与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它培育了一个与传统及保守的学派相对抗的企业家经营的学派,其思想方式与价值标准都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展的同时,英国开始出现一场严重的木材短缺。正如当时有一位人士所说的:

“回忆一下以前,人们一直认为英国不可能缺少木头。但是,除了在炼铁、烧砖和烧瓦中对木材的极度浪费外,为了发展航海业也耗费了大量的木材。加上住房建造的无休止的增长,加上木材大量耗费在制作家具、木桶和其他一些不可胜数的容器上,以及耗费在制造两轮轻便马车,运货用、载人用的四轮马车上,由于上述的对木材的巨大消费和忽视了植树造林工作,以至于造成今天全国上下木材奇缺的局面。”

木材短缺是一次挑战。由于依靠了人的智慧,依靠了开采便利,供应充足的煤炭,这次挑战才可能被顺利地应付了过去。采用煤炭作为家庭以及工业生产的燃料,使得英国稳步踏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

今天,经济和社会史学家往往一提起十六世纪,就把它称作欧洲经济和社会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将十七世纪描绘成灰暗一片,含混其词地说什么“十七世纪危机重重”。将问题简单化,从根本上说,固然常常能揭示一些真理,但是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应当有所保留地被接受。事实上,1500年至1550年这段时期对意大利来说并不是黄金时代。正好相反,意大利当时成了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厮杀的战场,饱受了战争、瘟疫、饥谨和贫困的折磨。由于同样的原因,后半个世纪对于低地国家的南部来说实际上也并不是黄金时代。要明白这两个特殊例证的重要性,就必须回顾一下十六世纪初,当时低地国家的南部和意大利的中北部正好是欧洲的两个最为发达的地区。另一方面,十七世纪对于西班牙、意大利和

德国来说是一个黑暗的世纪，对于法国来说至少也是一个灰暗的世纪。然而，对于荷兰，它却不失为一个黄金时代；对于英国，如果算不上黄金时代，起码也算是一个白银时代。

议论这些特殊的例证，并非纯粹要卖弄学问，以此取乐。假如将十六世纪看作是一个普遍繁荣兴旺的时代，而将十七世纪看作是一个危机连绵起伏的时代，那么我们将更难领悟和理解在这两个世纪中欧洲历史上的主要事实之一。低地国家的南部所遭受的连串灾难正好为其北部的黄金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是：十七世纪对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来说是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纪，但对于低地国家的北部和英国来说，它却是一个扩张的时期，这导致了所有地中海国家的衰落，使得重要的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了北海。1500年至1700年这两百年间，不仅欧洲与世界的其他地区之间失去了力量的平衡，甚至欧洲本身的内部均衡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在列奥那多时代有一个叫马梯尼的欧洲人能预见到这场工业革命，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认为这场工业革命是发生在意大利。到十七世纪末叶，事情已经很明显，只有在北海沿岸的国家经济才有可能取得任何规模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章 1500—1700年 的欧洲人口

罗杰·莫尔斯

第一节 两个世纪中人口的演进

首先提出问题:从人口统计学的观点来看,在亨利七世至安妮女王统治的这两个世纪期间,欧洲有否显示出任何明显而又突出的特征?一方面,与先前的中世纪相比较,另一方面,与以后的十八世纪相比较,这些特征在人口史的发展中又起了怎样的作用?

回答是:十六和十七两个世纪经历了欧洲人口史变化的第一阶段——首次削弱了中世纪的人口模式,并开始了那个时代的人口革命。这些变化对出生数与死亡数之间的联系并未起显著影响:根据判断,在十七世纪末以前这些数字及发展趋势几乎没有变化。然而,在基础结构和环境方面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否则人口革命将决不会具有它已经采取的这种形式。

有三个突出特征可以帮助阐明这个关键的时期。

1. 在地理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式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些方面发生了各种变化。这些变化对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

1500年至1700年期间,欧洲的外貌起了变化;贸易的主要通道转移了;近代国家得到了巩固。欧洲从前处于封闭状态,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对外部世界也只不过是浮光掠影地看了几眼而已,还从未有一个人曾遍游全世界。两个世纪之后,在一个开放

的欧洲,沿海国家正参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考察和开发;从前的莫斯科公国,即现在的俄国,已经把征服远东的西伯利亚当成其领土扩张的第一步。在1500年还只是面向着地中海和波罗的海的欧洲,现在已变成了面向大西洋的欧洲。大西洋沿岸一带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地区和港口发展了起来。里斯本、塞维利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尤其是伦敦,足以和原来地中海及汉萨同盟的一些中心相媲美。具有新诞生的君主国的欧洲已经成为具有近代国家的欧洲。伴随着这些国家的兴起,它们那些大大小小的都城也相继兴起。这些居住着王家贵族的宫廷城市压倒了旧的城市共和国。德累斯顿、慕尼黑、斯图加特,尤其是柏林和维也纳,令人眼花缭乱地扩展起来,而同时,帝国的那些自由城市却几乎难以苟存。两百年前,马德里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市镇,这时却明显地在伊比利亚所有的城市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那些低地国家中,布鲁塞尔巩固了它与对手们竞争的地位,在联合省中,阿姆斯特丹成了佼佼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主要城市之间也起了同样的对比变化,虽然还不是那么剧烈:与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相比,莫斯科取得了更高的地位。甚至在意大利这个深受大转移潮流之害的国家中,除去都灵以外,在1500至1700年间,罗马是唯一规模扩大了三倍的城市。弗朗西斯一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这些君王的政治曾对法国首都的发展大有裨益,这一点谁又能怀疑?

如果说在各国城市中发生了中心转移,那么,各国乡村的中心反而变得更为牢固。无疑,欧洲的乡村主要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上半叶达到其鼎盛时期的。但是,甚至在这之前,乡村中也已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土地用于新的目的,采用新的轮作制、新的耕作技术和新的农作物;在能源的利用(磨坊)以及森林和矿产资源的开发上都有所发展;手工业甚至工业侵入了农村;

减少了以前的公地以便更充分地开发利用土地；减少了那些在需求中最不重要的谷物的生产以便进行集约耕作，发展牧场和果园；通过修建公路、开凿运河使交通手段逐渐开始了现代化；另外，乡村的安全也得到了显著加强，所有这些，都明显增加了乡村的人口潜力。

在 1500 至 1700 年间，虽然还谈不上什么工业革命，甚至更谈不上今天所谓的中央集权，但我们还是列出了一些在经济的第二和第三级部门中所发生的实际的进步。旧的制造业中心日趋衰落或仅能勉强支撑，同时，新的制造业中心以及新的商业中心和新的银行业中心发展了起来。各国首都在行政上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的同时，文化生活也经常能得到丰富。1700 年的资产负债表在各方面都与 1500 年的资产负债表有显著的不同。

基于归纳法的经验哲学的发展与基于观察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进步势必有利于人口统计表的制定。由于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更为重视人的价值，由于各种重商主义思潮都将人口视作国家财富而赋予其很高的地位，由于地理大发现激起了人们对一切能够丰富地理知识的材料的兴趣，人口统计更成为大势所趋。在 1500 年，政治算术这项工作还是无法想象和不可能实行的。等到 1700 年，它已非常自然地成了当时的一种趋势，而且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众所周知，我们的祖先无论是生活在城市或是乡村，他们的工作与居住条件一直都不符合最基本的公共卫生的要求。我们所讨论的那个时代还根本谈不上理想世界的实现，但是，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肯定从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末我们祖先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没有得到一点改善吗？恰恰相反，在住房建造和设计方面，在水的供应和城市建设的其他方面，以及在市镇的健康检查工作方面，似乎都有了一些改进，这对人口产生了某种影响，尽管这种

影响是有限的。

对人口的更主要的影响应当归因于食物的变化(例如,新的食品和食物中动、植物成分的比例有了不同)。^①此外,个人卫生和衣着都有了种种改善,医疗条件也有一定改善,在某些地区,人们还把孩子送到乡村中(交给奶妈)去养育。

A. 朗德里曾说:“出生率的降低是由于道德观念与对生活的普遍看法的改变所造成的。”^②在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期间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心理因素的改变。这些心理因素涉及到家庭以及孩子。家庭精神和家庭生活具有了范围更狭小、更深刻和更少宗族色彩的性质。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个人权利和教养孩子的责任。^③所谓“欧洲式的婚姻”(见后)最初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对此我们是否应该根据以上的线索找出某种解释?

最后,作为从十六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中叶这整个时期特征的一连串的粮食危机必须归咎于气候的变化,这一点也是十分肯定的。荒年总计有 50 年左右,其中有几年重灾荒,对人口有相当大的影响。

2. 另一个关系到公众健康水平的突出的特征仍然是神秘莫测的,至今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1500 年之前的多年中,欧洲曾屡次受到一系列传染病的侵袭。此后,这些传染病又持续了 150 多年。但是,自从十七世纪中叶起,这些周期性传染病发生的次数开始减少。1660 年至 1665 年这五年之后,欧洲有许多地区,甚至包括一些城镇,再也没有发

① W. L. 兰格:《欧洲最初的人口爆炸》,载于《美国史评论》,第 69 期(1963 年),第 1—17 页。

② A. 朗德里:《论人口统计学》,巴黎,1945 年,第 636 页。

③ P. 阿里埃斯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过去的这个方面。例如,可参见《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人们对待生活和死亡的态度》,载于《人口》,1949 年,第 4 期,第 463—470 页,也可参见《旧秩序时代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巴黎,1960 年。

生过“瘟疫”。1693年至1694年间的那场可怕的危机以及1709年“寒冬”的那场危机只不过让《启示录》中的最后两位骑士碰了个面，头一个最可怕的那位骑士不得不将他的马留在马厩里。要不然的话，路易十四的统治将会落个与三十年战争同样悲惨的结局。

那么，这种已成为传统的祸害怎么会逐渐减少的呢？有人认为，伦敦在1665年那场可怕的“瘟疫”发生之后，紧接着在1666年起了一场大火，伦敦城有一大半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但同时大火也肃清了经常引起传染病的温床。这一点虽然无法证实，却也不无可能。然而，自1660年至1665年这五年之后再也没发生过瘟疫的城市并不仅只限于伦敦。另外一些城市，例如阿姆斯特丹，就从来没有被化为灰烬。因此，不管怎么说，十七世纪最后的30年中，在公共卫生方面一定发生了某种神秘莫测的事情。

到1700年，瘟疫在欧洲绝迹的日子已近在眼前。只有中欧还有一些地方，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1709—1714年）以及普罗旺斯（1720—1721年）最后遭受了一次瘟疫余孽的侵害。自此，欧洲的疾病史——间接地说，也就是欧洲的人口史——在全新的条件上建立了起来。只有当人类生存的环境摆脱了瘟疫周期性侵袭的威胁，只有当人口不再被每个世纪都会出现10次或15次的瘟疫所大量消灭时，人口革命才有可能发生。

3. 最后，参考文献，而不是参考史实，能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我们的有关这个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来源虽然不充足，但较之有关中世纪晚期的资料还是要更全面、更丰富一些，且不用说与更早的那些个世纪相比较了。下面一章将明白论述这个问题。

从人口统计上来看，毋庸赘言，整个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形成了一个十分相异的背景。1500年至1700年这一时期没有显示出任何明显的突破。十六世纪初的那几十年人口的状况比较类似于